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37-14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17

Hans汉斯

文化工业批判视域下的犬儒理性批判研究

艾柯代姆·克依木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5日

摘　要

本文旨在揭示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娱乐化与商品化三重机制生产犬儒心态的逻辑，并考察其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延展。采用理论分析与批判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基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结合平台经济现实展开分析。标准化使消费者在识破编码规则中获得认知快感，却未导向对生产体系的质疑，反而成为维系消费循环的心理凭据；娱乐化将否定性话语收编为注意力经济素材，使批判姿态被去激进化；商品化将知行分裂固化为日常程序，使消费者在心知肚明中放弃追问。文化工业由此成为犬儒理性再生产的训练场。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通过算法将用户行为抽象为流量数据，使用户在清醒认知中持续参与数据生产与资本积累。结论表明，文化工业不再依赖制造幻觉维持参与，而是经由日常运作使人习惯于在清醒中主动配合，犬儒心态由此成为数字平台运行的结构性条件。

关键词

犬儒理性，文化工业，启蒙的虚假意识，数字资本主义，知行分裂

A Critical Study of Cynical R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itiqu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ikedaimu·Keyim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ober 4, 2026; accepted: October 26,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5,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how the cultural industry produces cynicism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entertainmentific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and to examine how this mechanism extends under

文章引用: 艾柯代姆·克依木. 文化工业批判视域下的犬儒理性批判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37-143.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17

digital capitalism. Us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study finds the following. Standardization lets consumers gain cognitive pleasure from deciphering coded rules, but this insight does not lead them to question the production system; instead, it helps sustain the consumption cycle. Entertainmentification turns negative discourse into material for the attention economy, making critique depoliticized. Commodification turns the split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into daily routine, making consumers give up inquiry even when they know what is happen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us becomes a training ground for reproducing cynical rationality.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platforms use algorithms to turn user behavior into traffic data, so users keep taking part in data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with clear awareness. In conclusion, the cultural industry no longer relies on illusions to keep people engaged; instead, it gets people used to actively cooperating in full awareness through everyday operations, making cynicism a structural condition of how digital platforms operate.

Keywords

Cynical Rationality, Cultural Industry, False Consciousness of Enlightenment, Digital Capitalism, Split between Cognition and A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传统中，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揭露虚假意识，唤醒被蒙蔽的大众，从而催生革命实践。这一逻辑预设了知与行之间的直接通道，一旦真相被揭示，行动便会随之而来。然而资本主义的延续现实并未印证这一预设。人们并非始终处于被蒙蔽的状态，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看清了体制的虚伪、资本的算计与媒介的操控，却依然维持着顺从的姿态。

古典犬儒主义源于古希腊，以第欧根尼为代表，主张按自然本性生活，蔑视社会习俗与权力，以身体实践对抗主流价值，是一种激进、公开、肯定性的否定姿态，其目标在于改变世界。现代犬儒主义是斯洛特戴克所命名的“启蒙的虚假意识”。其核心特征在于知与行的分裂，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虚假、体制的虚伪与资本的算计拥有清晰的认知，却不再将此种认知转化为反抗实践，反而以冷嘲热讽的姿态适应现存秩序。它区别于古典犬儒以身体实践对抗主流价值的激进否定，转而以“看透一切”的优越感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位置。现代犬儒并不否定一切而是在否定中保持对系统的参与，使清醒认知与顺从行为得以安然共存。在文化工业的持续运作中，这种心态被系统性地生产出来。标准化生产提供识破编码的认知快感，娱乐化机制将批判收编为消费素材，商品化逻辑则将知行分裂固化为无需反思的日常程序。由此，现代犬儒主义不再是个体的道德缺陷或心理偏斜，而成为资本统治下一种普遍的结构性意识状态。它不需要人们相信体制的合法性，只需要人们不采取行动，因而构成了当代资本统治最为稳定的心理基础。

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将这一状态界定为启蒙之后的虚假意识。按照他的判断，现代犬儒主义是现代化的不愉快的意识状态，启蒙的劳作在这种意识身上既取得了成功也遭遇了失败[1]，这种意识接受了启蒙的教育，却未能将所学付诸实践。它既富足又贫困，不再受到任何意识形态批判的有效触动，其虚假性已经获得了反思性的保护[2]。斯洛特戴克进一步指出，现代犬儒主义者“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但他们依然在做，因为从短期来看，境况所迫以及自我保护的本能口径一致地告诉

他们，非如此不可”[2]。齐泽克随后将这一判断提炼为行为主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清晰的认知，却依然坦然为之。这意味着幻觉已经不再停留于认知层面，而是转移到了行为层面。人们即便在理智上识破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构造，其行为依然受到幻觉的引导[3]社会用工具理性，摧毁了道德和理想的空间，然后通过文化工业让人们在娱乐中懒得思考，同时现实生活又逼着人们不得不顺从最后人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都看透了，但什么也不做”的犬儒主义者。既有讨论的局限在于，它们大多停留在对犬儒主义症状的描述与个体策略的争论上，而较少追问犬儒心态究竟如何被系统性地生产出来，又如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完成结构性升级。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推进一步，将犬儒理性的生成问题置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揭示的文化工业这一物质性装置中加以考察，考察文化工业如何通过标准化、娱乐化与商品化的运作机制，将犬儒理性从一种可能的意识状态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难以逃脱的日常生存处境，进而揭示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研究的是文化工业怎样把犬儒心态变成一种普遍的、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以及数字时代这个现象为什么更严重、怎么才能走出来的问题。

2. 文化工业的犬儒化功能与日常生活渗透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虽未直接使用“犬儒主义”这一概念，却在理论上深刻触及了犬儒心态的结构性根源。在他们看来，启蒙的计算理性在征服自然与支配社会之后，反过来吞噬了自身所承诺的解放潜能。当工具理性成为唯一合法的合理性形式，当道德法则无法在赤裸的自我保存逻辑中找到现实支点，文化工业便通过标准化生产与伪个性化包装，系统性地消解了一切超越性批判的可能。个体在此境况中被迫陷入一种分裂的生存状态，他们隐约意识到文化产品的虚假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却找不到任何立足的外部立场来加以抵抗，只能知道却无能为力。就此而言，他们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对现代犬儒理性根源的深层批判。

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则提供了一条迥异的分析路径。他不再追问犬儒主义的社会起源，而是转向犬儒主义者独特的主观意识结构。犬儒主义的本质不在于被欺骗，而在于已经启蒙却仍然选择顺从。他完全清楚世界的虚伪和规则的荒谬，却出于自我保存的精明算计而主动参与这场集体性的假装。由此反观文化工业，一个认识论层面的倒转浮现出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将犬儒心态理解为文化工业总体统治所强加的被动后果，而在斯洛特戴克的框架中，知假仍从的犬儒机制恰恰构成了文化工业得以持续运转的主观前提。如果大众真的相信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体系或许反而难以维持，正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假装相信的默契中各自获得安全的生存空间，这种虚假的共识才变得如此稳固。二者共同面临一个理论难题，当犬儒主义被归结为体系的必然产物或主体的普遍策略时，批判本身的位置和可能性便成为一个棘手的疑问。这提示我们，对文化工业与犬儒主义关系的完整把握，既需要客观的结构分析，也需要对主体如何在启蒙状态中有意维持自我麻痹的机制予以揭示，唯有在二者的交互视野中，理论批判才可能真正穿透文化工业的物化表象。

文化工业对消费者心理的塑造，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加以考察。认知框架的预制、情感结构的置换与行为动机的内化。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心理规训的闭环。在认知层面，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重复性的文化产品为消费者预先搭建认知世界。阿多诺指出，流行音乐具有“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特征，表面多样实则高度趋同，使消费者误以为自身选择独立，实则注意力投向已被符号秩序预先编码。在情感层面，文化工业将社会中的焦虑情绪从具体情境中剥离，重新锚定于消费行为。鲍德里亚揭示了从物到符号的消费的转变，消费者购买的并非使用价值，而是附着其上的情感承诺与身份象征[3]。在购买“盲盒”热潮中，近七成受访者购买动机源于收集刺激与社交分享，而非情感寄托，情感体验深度由此被削平，取而代之的是高度依赖外部刺激的情绪。在行为动机层面，文化工业实现了最深层的塑造。消费者将外在规训内化为欲望的自我驱动力。马尔库塞提出“虚假需要”概念。这些需要并非源于个体

真实生命需求，而是被文化工业为维持系统运转而强加。“盲盒”制造的稀缺性与不确定性使消费者陷入欲求悖论循环，越追求心仪款式购买次数越多，每一次消费在满足瞬间便被植入新的匮乏。消费者动机从需要外化为“我应当被看见拥有”，陷入身份维持性消费的永恒循环。认知引导注意力，情感驱动反应，动机催生行动。而行动后的匮乏感，恰恰反过来巩固了最初的认知预期，使这一循环不断自我延续。

3. 启蒙精神的崩溃与批判能力的消退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从生产之初即为交换而存在，其内容与形式皆遵循预设模式。启蒙的本意是用理性取代神话，将人从恐惧和蒙昧中解放出来。当计算理性成为唯一标准时，理性本身被工具化，蜕变为统治自然的工具，最终反过来统治人本身。工具理性不满足于对自然的宰制，更视人为物，试图用计算方式打造无所不能的体系。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的产物却走向启蒙的反面。工具理性扩张到极致之后，所有价值都被换算成可以计算、可以兑换的利益。崇高、真诚、理想这些概念逐渐失去位置，剩下的只是怎样保全自己、怎样不输在眼前的算计，这正是犬儒理性生长的土壤。启蒙精神与犬儒气质，本质上都是资本二重性在精神层面的不同表达。资本逻辑向所有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最终催生出这样一种人在理性上已经足够清醒，在行动上却只能顺从的精神状态。文化工业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并持续生产犬儒心态，有其深层的历史条件，即启蒙理性自身的病变。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核心命题在于，启蒙运动旨在以理性取代神话、解放人类，然而理性在其实现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当理性被简化为纯粹的计算与支配工具时，它便从解放的力量蜕变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这一病变的具体后果在于道德根基的瓦解。工具理性将一切还原为可计算、可控制的同一性逻辑，无法承载任何超越性的道德学说。价值判断由此沦为利益计算，知行断裂成为系统性的必然，而非个体的道德缺陷。文化工业在这一结构性病变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工具理性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以标准化、可计算的生产逻辑取代艺术的自主性。同时也是这一逻辑的自我确证，通过不断生产同质化的文化产品，反复印证一切都不过是商品的犬儒世界观。当批判失去了超越性的价值支点，当一切皆可被解构成为唯一确定的立场，批判本身便陷入了自我消解的困境。

文化工业不仅延续了早期工业社会通过广播与电影塑造集体无意识的统治功能，也在算法深度介入媒介分发的当下升级为一套更为精密的注意力收割机器，以即时快感替代社会关切，以碎片信息消解历史想象，从而将反抗意识溶解为数据流中转瞬即逝的情绪脉冲。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是“自上而下整合其消费者”的标准化生产体系。资本逻辑对文化的改造，核心手段是将一切不可量化的精神品质转化为可计算的交换价值。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生产，让消费者反复产生一种“我已经看穿套路了”的错觉。但这并没有让人去质疑整个文化生产系统，反而成了他们继续心安理得消费下去的理由。用“我懂”的幻觉代替了对真实权力关系的追问。文化工业的另一套操作，是把批判本身也变成娱乐，变成新的流量来源和消费内容。批判的锋芒被磨平，反抗的冲动在笑声中被消耗殆尽。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是“无原则的嘲讽、无肯定的否定、无同情的谩骂、无建设的批评”，[1]这种看似激的烈批判姿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改变现实的力量。虚假意识从盲目受骗到清醒顺从升级，从传统意识形态到现代犬儒主义，虚假意识的形态发生了一次根本转变。传统意义上的虚假意识以不知情为前提，主体并不清楚自己身处幻觉之中，因此启蒙一旦发生，觉醒便是可预期的结果。现代犬儒主义中主体什么都清楚，什么都看得到，但这份清醒非但没有促成解放，反而让顺从变得更加从容和坦然。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出发，将犬儒主义现象视作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社会结构的必然[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认为犬儒主义是启蒙的核心计算理性无力承担起道德学说的必然结果[5]。这一转变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揭示真相来唤醒大众的策略已经不再管用。

4.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犬儒理性的结构性升级

前文所论文化工业的犬儒化功能，其运作主要局限于文化消费领域。在此阶段，犬儒理性表现为一种审美层面的认知姿态。消费者在观影、听歌、追星等活动中经历着看透却顺从的认知分裂，但此种分裂尚未溢出闲暇时间的边界，亦未从根本上危及主体的生存处境。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这一格局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从文化消费领域扩展至整个日常生活领域，犬儒理性随之从一种可选择的姿态转变为一种难以退出的生存处境。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犬儒理性不再仅仅是个体面对文化产品时的心理反应，而成为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

控制范围从闲暇时间延伸至全部生活时间，其实现机制在于平台对日常生活基础设施的全面接管。在传统大众传媒时代，文化工业的消费者可以在观影、收听广播之后离开文化产品，回归非文化工业的生活领域。然而在数字平台经济中，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移动支付、外卖平台等已构成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用户无法如关闭电视那般轻易退出平台。平台通过将自身嵌入工作、消费、社交、出行等各个环节，使个体全天候处于数字文化工业的覆盖之下。斯洛特戴克所描述的“环境的压力与自我保存的本能说着同一种语言”在此获得了新的物质基础。不使用微信意味着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不使用外卖平台意味着日常生活的不便。犬儒理性的运作时间从闲暇时段延伸至全部生活时间，正是以平台成为生活必需基础设施为前提才得以实现。

控制对象从文化消费延伸至日常劳动，其实现机制在于数字平台对劳动与娱乐边界的系统性模糊。在传统文化工业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角色是分离的。消费者消费文化产品，但不直接参与其生产。数字平台打破了这一分离。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内容、创作视频、参与互动，这些行为在主观体验上属于娱乐与社交，但在平台的经济逻辑中却构成了创造价值的数字劳动。劳动与娱乐的界限被模糊化[6]，用户在“玩劳动”中误以为自己是在玩乐，实则已成为平台资本攫取价值的渠道。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犬儒理性不再仅仅表现为“我知道这是文化工业的产品却依然消费”，而是升级为“我知道自己在为平台创造价值却依然参与”。当外卖骑手明知算法在压缩配送时间却不得不接单，当内容创作者明知平台在抽成却不得不持续更新，犬儒理性的对象已从文化消费领域延伸至劳动领域，其性质也随之从审美判断转变为生存策略。

控制性质从可选择的消遣方式转变为难以退出的生存处境，其实现机制在于平台权力对退出机制的实质性封锁。传统大众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可以选择不看电视、不听流行音乐，此种退出不会威胁其基本生存。然而在数字平台经济中，退出往往意味着丧失社会参与的基本条件。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制造信息茧房以隔离用户，通过将劳动者打散为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以瓦解集体认同和组织依托，通过流量分配权控制内容创作者的曝光机会。当个体发现不使用平台便无法工作、无法社交、无法获取基本信息时，犬儒理性便不再是一种可以随时放弃的姿态，而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存状态。正如余政所指出的，控制性质从一种可选择的消遣方式转变为一种难以退出的生存处境[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犬儒理性构成了对传统犬儒主义的质的升级。它不再是个体面对虚假意识时的心理防御机制，而是平台权力结构对个体生存方式的全方位塑造。

三重升级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犬儒理性的新形态。控制范围的扩展使个体无处逃遁，控制对象的延伸使劳动本身被纳入犬儒化的轨道，控制性质的转变则使退出变得几乎不可能。三者共同作用，犬儒理性从审美层面的精神姿态沉降为存在论层面的生存条件。这种犬儒更为顽固，亦更难通过单纯的启蒙来克服。当一个人明知算法在剥削自己却无法离开平台，明知数据在被收割却无法不使用社交媒体时，批判理论的经典策略，即通过揭示真相来唤醒主体，便遭遇了其根本限度。问题不再是主体是否清醒，而是清醒之后，主体是否还有不服从的可能。

5. 当代批判精神的重建与犬儒理性的超越

犬儒主义的普遍化使得真正的社会批判变得不可能。传统的批判依赖一个基本前提，批判者相信存在一种更好的可能性。当怀疑变成无原则的否定，批判就失去了建设性维度。批判能力的弱化意味着社会失去自我反思和修正的动力，既有的支配秩序在“大家都清醒”的幻觉中平稳运行。这种批判的失效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躺平、摆烂等话语的流行，看似是在重新评估值得追求的目标，实则更像是一种价值上的撤退。年轻人在不想继续卷入过度竞争与找不到另一种活法之间左右为难，批判停留在嘴巴上，行动停留在顺从里。这正是犬儒理性带来的价值困境。从资本统治的角度来看，犬儒理性比传统意识形态具有更强的维稳效果。传统意识形态还需要人们对合法性抱有信念，而犬儒理性连信念都不再需要，它只需要人们不采取行动。当一个劳动者清楚自己处于被剥削的位置，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继续从事这份劳动时，资本就不再需要费力论证自身的正当性，只需要维持这种别无选择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犬儒理性构成了当代资本统治最稳定的心理基础。现代犬儒主义对启蒙秩序与价值理想的伤害是深远的，现代启蒙必须克服这种病变，才能确保走向正轨。

超越犬儒的第一步，是破除文化工业制造的批判即娱乐的陷阱。当吐槽、玩梗、段子成为批判的主要形式，批判本身就失去了改变的力量。需要正视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而非将其转化为无害的笑料，拒绝将严肃问题娱乐化，拒绝以“认真你就输了”消解一切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需要重建一种理性的社会批判文化。真正的批判既不是盲目的信仰，也不是虚无的怀疑，而是在两者之间保持张力。这种批判文化需要恢复批判的建设性维度。批判是为了改变，它要求批判者不仅指出不对，还要追问改变的可能。同时，超越犬儒主义有赖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德性伦理、个体信仰和独立人格形成的合力作用，不能仅靠个体的道德自觉，还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变革。

对于陷入犬儒心态的群体而言，超越的道路在于树立积极的价值追求。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的结尾处指向了一种“复兴古典犬儒”的可能性。那种敢于以身体践行真理、敢于用生活方式对抗虚假的勇气。古典犬儒与现代犬儒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保留了对另一种生活的信念和践行。走出玩世顺从，不是让人们重新陷入盲目的理想主义，而是帮助他们建立清醒但不放弃的立场。看清现实，同时相信改变的可能。

从古典犬儒到现代犬儒，犬儒理性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蜕变。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生产和娱乐化收编，将“知行分裂”从偶然的心理状态固化为日常的行为模式。数字资本主义则将这一训练从文化消费领域扩展至全部日常生活[8]。本文以斯洛特戴克提出的启蒙的虚假意识作为分析起点，结合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资源，考察犬儒理性在当代社会中的生成路径及其造成的社会效应。克服犬儒主义的关键不在于认知层面的再启蒙，因为犬儒主体早已处于清醒状态。真正的难题不是如何唤醒他们，而是如何改变那个让清醒地接受现状成为唯一可行选项的社会处境。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已经表明，拜物教并非认识层面的偏差，而是根植于社会存在自身的结构。只有触及结构性维度，才有可能打破知行断裂。

参考文献

[1] 孔明安. 犬儒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J]. 现代哲学, 2012(4): 7-13.

[2] 斯洛特戴克. 犬儒理性批判(前言) [M]//生产(第 11 辑). 贾涵斐,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34-37.

[3]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4] 操奇. 启蒙的天敌: 犬儒理性论略[J]. 哲学研究, 2015(6): 91-96.

[5] 李乾坤. 犬儒主义与现代性批判——论启蒙道德的内在矛盾与批判理论的反思[J]. 世界哲学, 2022(5): 94-105, 160-161.

[6]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7] 刘衍峰, 涂良川. 技术封建主义表征资本本质的政治逻辑及其批判[J]. 社会主义研究, 2025(3): 46-53.

[8] 数字时代的资本矛盾深化(一)——关系异化与算法霸权[EB/OL]. https://finance.ifeng.com/c/8qCXIocLbqi, 2026-01-25.